

纪中叶), 南唐有一县令在他官宅庭院里穴地为球窝, 教习他的孩子进行捶丸游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在我国河北钜鹿发掘了许多宋瓷, 其中有一陶枕, 枕上绘制两幅儿童正在挥杆欲击地进行捶丸游戏。另外, 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以及故宫所藏的绘画中都有反映儿童参与类似捶丸的游戏。这充分说明, 我国自十世纪中叶捶丸已经广泛流行, 并随着唐宋时期城市的布局与居民结构的变化, 大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兴起, 表现得更为活跃和丰富多彩, 呈现出一派杂花生树、大野芳菲的景象。由此, 步打球衍生出了捶丸游戏, 成为宋、元时期深受广大平民喜爱的游戏项目。另从元代《丸经》的记载中, 彰显出了当时的捶丸游戏已具备了竞技特征的体育运动。并在各条规则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这不仅说明市俗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形成的基本土壤, 更主要是市俗文化和宫廷文化的交汇, 从而推进了古代的游艺活动向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向。

古代捶丸的风行, 也说明了中国古人也打高尔夫球, 而且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项全民性游艺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自十世纪中叶已流行此项活动, 而且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与现代高尔夫球进行比较分析, 印证了中国的捶丸是现代高尔夫球的源头。同时也看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的纵剖面 and 横剖面, 更可以看出自春秋战国盛行的蹴鞠, 直至汉唐宋元以来的马球、驴鞠、步打球、捶丸等多元因素构成的体育有机体的运作与发展, 以及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由此而论述球类活动之渊源形成与流变。也充分揭示出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对世界球类运动发展的贡献。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之发展

——以《通报》为中心的讨论

丁斯甘^{1,2}

- (1.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2.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创刊于 1890 年、由法国和荷兰汉学家联袂主编的《通报》汇集了欧洲汉学界主要研究成果。截止 1944 年,《通报》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 确定了其汉学研究的期刊定位, 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平台, 是法国汉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通报》设置的“学术论文”“书目”“讣告”等栏目记录了法国汉学的历史与动态, 反映出法 20 世纪上半叶国汉学研究的研究范围专精、研究方法更新和学术自觉性加强的特征。

关键词: 通报 法国汉学 书目学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184-09

法国汉学起始于 18 世纪, 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翻译、阐释和推广中国的古典典籍, 引起了法国人乃至欧洲人的广泛兴趣。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讲座, 标志着专业汉学的形成。雷慕沙 (Abel-Rémusat, 1788-1832)、儒莲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 是 19 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汉学家。法国汉学家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推动法国汉学进入繁荣期。他的研究涉及多个汉学领域, 沙畹的《史记》译著手稿中包含了导言、注释和详尽的目录, 在当时的欧洲“都缺乏与之匹敌者”^①, 他培养了包括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 (Henri Maspéro, 1883-1945)、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法国汉学家, 他们使 20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尤为光彩夺目, 可称为“沙畹——伯希和时

收稿日期: 2019-10-10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2020jbykyjd002)

作者简介: 丁斯甘 (1985-), 女, 江苏无锡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究。

^① [法] 戴密微著, 耿昇译《法国汉学研究史》, 耿昇编《法国汉学史论》上册,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年, 第 116 页。

代”，^① 巴黎也获得了“西方汉学之都”的美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使法国汉学界失去了多位汉学巨擘，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相继去世给予了法国汉学界沉重的打击，因此 1945 年可以称为整个法国汉学研究史上“重要的分水岭”^②。汉学史研究属于学术史研究范畴，以文献学为中心的汉学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与稳定的演变特征，通过整理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其汉学发展轨迹。《通报》（*T'oung Pao*）是法国最具权威性的汉学期刊之一，多位著名汉学家都曾担任其主编。以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担任主编时期发行的《〈通报〉，1890—1944 年四十七卷总索引》（*Index Général des Quarante Sept Premiers Volumes années 1890—1944*, 1953）为依据，梳理《通报》所刊发的文章有助于把握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欧洲汉学史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征。

一、法国汉学期刊《通报》概述

1889 年，考狄（Henri Cordier, 1894—1925）、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和布里尔的两任编辑思道普拉尔（M. F. de Stoppelaar, 生卒不详）和奥尔特（A. P. M. van Oordt, 生卒不详）在前往奥斯陆准备参加东方学家会议的列车上提出创办一份东亚研究的学术期刊，布里尔出版公司（Brill）负责印刷出版，考狄和施古德联袂担任主编，1890 年《通报》创刊。施古德去世之后，沙畹于 1904 年继任施古德的主编一职，与考狄一起成为《通报》的主编直至 1918 年去世。考狄于 1917 年至 1919 年独自担任主编工作，自 1920 年起伯希和成为《通报》的新一任主编，与考狄一同负责主编工作。1924 年考狄去世，伯希和于 1925 年至 1935 年期间独自担任《通报》主编一职。1936 年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与伯希和合作共同担任主编工作，两人合作近十年直至伯希和于 1945 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继任《通报》主编一职。

《通报》一般以一年一卷的规律发行，每卷有一至六期不等，截止 1945 年共发行 47 卷，其中 1920 至 1921 年、1925 年至 1926 年、1934 年至 1935 年分别合并为一卷，1927 年至 1929 年、1938 至 1940 年分别在三年中发行了两卷，因二次大战的原因 1940 年至 1942 年上半年合并为一卷，1942 年下半年至 1944 年共发行一卷。1890 年至 1899 年出版的《通报》被编为第一集（*Série I*），1900 年至 1909 年在《通报》封面就注明了 *Série II*（第二集），自 1910 年起期刊封面用更为简洁的卷号（*vol.*）替代了集号“*Série*”，此后刊物一直使用卷号编号顺延下去。1935 年《通报》将每期的期号（*No.*）更改为册号（*Livr.*），并沿用至 1992 年。期刊的定价也略有调整，1890 年至 1912 年每

^①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7 页。

^②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二战之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 2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第 466 页。

卷为 12 荷兰盾，1913 年至 1916 年涨至 14 荷兰盾，1917 年至 1944 年每卷的价格固定为 16 荷兰盾。

《通报》截止 1944 年，期刊共出现了 13 个栏目，栏目出现的次数依次为：“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共 47 次、“书目”（Bibliographie）42 次、“杂识”（Mélanges）41 次、“讣告”（Nécrologie）40 次、“纪事”（Chronique）36 次、“评论简报”（Bulletin Critique）33 次、“通信”（Correspondance）21 次、“按语与征询”（Notes and Queries）19 次、“杂录”（Variétés）15 次、“收到赠书”（Livres Reçus）6 次、“通告”（Annonces）3 次、“期刊文章”（Revue des périodiques）2 次、“官方资料”（Documents officiels）1 次。

《通报》的栏目可以分为专题类栏目、互动类栏目和资讯类栏目。专题类栏目主要刊发专题文章，包括专业性质的汉学论文、经典释读、混合性质的探险家游记、田野调查等文章、零散性质的书目、书评、讣告等，包括“学术论文”栏目、“杂识”栏目、“评论简报”和“书目”栏目和“讣告”栏目。每期发表一至五篇不等的论文，撰稿人多以专业汉学家为主，文章的学术研究价值大。《通报》1890-1944 年“学术论文”栏目每期刊载三篇左右的学术论文，一般在 30-50 页，有时甚至有 100 页以上的长文。《通报》“杂识”栏目数量不定，内容精炼、类似于作者随笔的研究札记，或者是对某一研究成果的补充。“评论简报”和“书目”从创刊就占据了重要地位，“书目”栏目基本囊括了欧洲、美国、中国、日本等出版的汉学专著或期刊，介绍出版物的基本信息，不做任何评价。“评论简报”是主编对文章或著作所阐述的观点进行评论，发表个人看法，篇幅相对较长。“书目”和“评论简报”栏目对西方语言、汉语和日语等汉学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语言犀利，石田干之助认为该栏目“最为丰富，而且最有权威”。^①伯希和担任主编后，从第 25 卷（1927-1928 年）开始取消了“评论简报”栏目，并将书评文章归于“书目”栏目中，并于 1925 年第 24 卷开始创立新栏目“收到书籍”，代替之前的“新到书籍”栏目。伯希和逐渐将部分书评归于此栏目中，第 27-29 卷“收到书籍”栏目长达上百页。戴闻达接任后将书评重新归至“书目”栏目中，该栏目恢复介绍新书基本信息的功能。“讣告”栏目自创刊就存在的栏目，主要刊发已故汉学家的生平，总结其汉学成就，列举其研究著作，对学术史研究颇有帮助。期刊主编是主要撰稿人，可以看出期刊对前人研究的重视，石田干之助对“讣告”栏目评论：“又本杂志特色之一，在斯学底名家逝世之际，撰载附有详细著述目录的传记，为编近代中国学史的所不容或缺的参考资料”。^②

互动类栏目主要为读者与编辑、作家与编辑、作家与作家之间提供一个沟通的平

① [日] 石田干之助撰，唐敬泉译《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学术界》第 1 卷第 5 期，1943 年 12 月，第 39-49 页。

② [日] 石田干之助撰，唐敬泉译《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第 41 页。

台，凸显期刊“交流”的特色，包括“按语与征询”栏目和“通信”栏目。“按语与征询”栏目共刊载了 105 则信息，内容主要为读者的来稿、回答读者的问题、或转载一些报刊文章的节选，篇幅较短，内容细碎化，并无标题和主旨，多数信息不到一页。考狄与施古德时期，该栏目是固定栏目，施古德去世后，该栏目迅速减少，仅在 1913 年（14 卷）、1914 年（15 卷）和 1920 年（20 卷）短暂出现过。“通信”栏目截止 1944 年共刊载了 56 封信件，作者多为汉学研究人员，作者通过该栏目与其他学者交流沟通，发表个人观点，进行学术讨论。

《通报》的资讯类栏目包括“纪事”栏目和“杂录”栏目，栏目信息碎片化，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国际学术会议的内容报道、报刊或官方文件的节选、政治谈判、政治人物的相关报道、一些探险家的报道。“纪事”栏目在 1890—1930 年期间基本为固定栏目，1931 年伯希和取消了该栏目。“杂录”栏目属于期刊草创时期，该栏目反映出法国和荷兰在远东的国际形势。1904 年沙畹继任主编后将国际学术会议报道、欧洲探险家报道归于“纪事”栏目中，“杂录”栏目取消。伯希和任主编时于 1924 年短暂恢复了该栏目，此后该栏目再未出现。

综上所述，《通报》通过栏目将文章分为了专题文章、交流互动信息和新闻资讯。截止 1944 年，期刊在 54 年的发展过程中，因主编旨趣的不同对栏目有所调整，因《通报》的学术特性故取消了“按语与咨询”栏目，取消了栏目特征不明显的“杂录”栏目，突出“学术论文”、“杂识”栏目的不同文章特色，合并“评论简报”与“书评”栏目，栏目不断精简，其形式内容不断规范丰富。

二、20 世纪上半叶《通报》的基本特征

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通报》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汉学期刊之一，就期刊的基本情况作简单说明：

1. 期刊作者分布

期刊的作者群体从国籍角度考察，可考者共计 190 名，法国作者共 89 人，约占 47%；德国共 32 人，约占 17%；英国 15 人，约占 7%；荷兰 13 人，约占 7%；美国共 12 人，约占 6%；其余俄国 7 人、比利时 4 人、匈牙利 3 人、意大利 3 人、瑞士 2 人、中国 4 人、日本 2 人、芬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各 1 人。国籍占比基本与发表了 3 篇文章以上活跃撰稿人国籍的占比基本一致，法国作者占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德国作者，荷兰籍作者无论在作者群体还是活跃撰稿人中都不占优势，可以证实《通报》是法国汉学的代表刊物。从职业身份角度考察，《通报》作者群体中职业可考者共 185 人，学者共 121 名，约占 65%，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群体；外交官 23 人，约占 12%；传教士 15 人，约占 8%。此外教师、军官、探险家、译员、记者、医生等多种职业也占据一定地位。作者群体与活跃撰稿人的统计数据保持一致，专业研究人员占据了绝对优

势，显示出20世纪前半期法国汉学研究趋向专业化的特征。

2. 期刊文章分类

以1953年《通报》出版的《题材的补充索引》(*Index Complémentaire par Matière*)为主要依据，《通报》刊载所有文章^①的研究领域按照数量排列，条目顺序依次为：文献与文学(653篇)、历史(431篇)、宗教(372篇)、艺术(290篇)、科技(257篇)、地理(205篇)、游记出使(204篇)、风俗(118篇)、书目(103篇)、贸易(80篇)、教育(77篇)、人类学(69篇)、交流(37篇)、政府(37篇)、人口(28篇)和法律(21篇)^②。进一步分析，《通报》中专题类栏目的文章数目远高于资讯类和互动类栏目的文章数目，专题类栏目是《通报》的核心栏目。专题栏目所收文章主要分为论文和书评，专题类中与中国相关的文章数量依次为：文献与文学(595篇，专文225篇，书评370篇)、历史(377篇，专文182篇，书评195篇)、宗教(329篇，专文132篇，书评197篇)、艺术(258篇，专文66篇，书评192篇)、科技(181篇，专文109篇，书评72篇)、地理(162篇，专文95篇，书评67篇)、游记出使(125篇，专文50篇，书评75篇)、风俗(90篇，专文35篇，书评55篇)、书目(86篇，专文23篇，书评63篇)、贸易(63篇，专文34篇，书评29篇)、人类学(57篇，专文18篇，书评39篇)、教育(29篇，专文19篇，书评10篇)、政府(25篇，专文9篇，书评16篇)、法律(18篇，专文4篇，书评14篇)、人口(18篇，专文8篇，书评10篇)、交流(13篇，专文5篇，书评8篇)。《通报》与考狄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 à l' Empire Chinois*)重合度高度重合，除了教育与交流条目外，《补充索引》的其余条目皆可纳入《中国书目》的总类别中，这些条目下的文章基本涵盖了《通报》与汉学研究的全部内容，符合其汉学期刊的定位。

3. 汉学学术期刊的确立

《通报》创刊封面副标题为“关于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语言、地理、人种志的研究”，主编声明中对期刊的定位有明确的说明：“填补远东民族研究的空白”。^③研究领域方面将中文文献中的中亚问题研究列在首位，考狄特别针对中国与中亚、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汉学家需要学习波利尼西亚和闪语族语言，强调了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跨学科合作，这也突出了《通报》刊名中“交流”的概念。考狄与施古德时期的《通报》并未将中国史研究放在首位，期刊关注

① 文章包括《通报》专题类、互动类、资讯类栏目的所刊文章。

② 因法国汉学各领域多有交叉和重叠，经常一篇文章可以同属于不同的类别，例如伯希和于1929年在《通报》第26卷上发表的《关于中亚研究的九个注释》(*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 Asie Centrale*)就涉及历史、文献学、地理等多个研究领域，故统计数据时会出现一篇论文涉及两个或更多的研究领域的情况，研究领域占比总数大于刊载文章的总数量。

③ Henri Cordier, Gustave Schlegel, 'Avertissement des Directeurs', *T'oung Pao*, Vol. 1, No. 1, 1890, pp. I-IV.

远东地区各领域的研究，研究范围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地区，内容繁杂，期刊的学术定位尚不明晰。1904 年沙畹接任《通报》主编后，1904 年 2 月 22 日写给考狄的信中写道：“我相信，有了《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和《通报》，法国汉学在科学界将占有一席之地。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考狄）不会后悔让我参与主编工作。”^① 由此可知，沙畹期望《通报》专门服务于汉学研究。1906 年布里尔出版公司经理、《通报》创始人之一思道普拉尔去世后，沙畹将期刊封面副标题改为“关于东亚的历史、语言、地理和人种志的资料”，缩小了期刊的研究范围。1920 年伯希和接任主编于 1931 年再次修改《通报》封面副标题，改为“通报或者东亚的历史、语言、地理、人种志和艺术资料”，研究地区不变，研究领域扩展到艺术史研究。

1890 年至 1945 年期刊“学术论文”栏目刊发论文共 551 篇，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共 405 篇，其中第一卷（1890 年—1899 年）共收录论文 102 篇，与中国相关的论文 67 篇，占总数的比例为 65.7%；1900 年到 1944 年共收录文章 449 篇，与中国相关的论文为 338 篇，占总数的比例为 75.3%。20 世纪开始《通报》多个领域中汉学研究文章和书评数量明显增加，条目增加比率依次为：文献与文学 8.7%、历史 5.1%、艺术 16.1%、科技 14.7%、地理 25.3%、游记出使 9%，证明了《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研究领域逐步细化。

综上所述，数据清晰地表明《通报》对汉学研究的关注逐年增加，研究关注点逐渐集中的特点，由此可以证明沙畹继任《通报》主编后，调整了创刊初期定位于远东地区的研究范围，是期刊定位的转变对文章刊布影响的直接反映，这个时间点的出现也证明了法国本土汉学的崛起，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法国汉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进步

通过上文可知，《通报》作为汉学研究的平台，与欧洲汉学发展紧密相关，期刊如实反映出法国汉学较之 19 世纪更具有科学性，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20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汉学机构与汉学期刊的创立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先后设立了多处汉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例如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波尔多大学和里昂大学的汉学讲座、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远东艺术史讲座、法国国家教育部下设“东方语言和文明”部门、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立。汉学机构的建立有助于专业汉学研究人员的培养。期刊方面，19 世纪法国乃至欧洲的学术期刊多以远东地区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亚洲研究的一部分，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通报》等专业汉学期刊的创立证明了法国汉学家从远东研究过渡到汉学研究，研究范围逐渐专精，

^① Henri Cordier, 'Edouard Chavannes',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18, No. 1/2, 1917, pp. 114-147.

《新中国评论》的主编库寿龄 (Samuel Couling, 1859-1922) 在《新中国评论》的编辑声明中就指出了《通报》等法国专业刊物对法国汉学发展的重要, 称法国的汉学刊物“共同维持了法国在这门科学中的领导地位”,^①《通报》等一系列专门汉学期刊的出现正是法国汉学飞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2. 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时期, 法国汉学家都从未来过中国, 缺乏田野考察, 法国汉学研究仍局限于翻译注释, 缺乏原创性, 研究深度不及德俄两国水平。20世纪初, 法兰西远东学院为法国汉学家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 汉学家有机会在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20世纪的法国新一代汉学家在继承了19世纪法国汉学家开创的文献研究法的同时, 利用中国考古发现、碑铭、题记等大量史料综合分析研究中国。沙畹、伯希和就是20世纪前期法国汉学家的代表, 沙畹“从法国学者那里, 他继承了一种精确地文献研究的头脑和方法, 及法国图书馆科学的可贵遗产; 从英美汉学家那里, 他了解到第一手田野考察经验和当代汉语知识的重要性”。^②沙畹重视使用考古材料, 开创了法国碑铭学研究, 他在《通报》上发表的《蒙古时期(元代)的汉字碑铭和令旨》^③系列论文使用文献考据学的研究方法翻译考释了云南大理的崇圣寺(即三塔寺)中的汉字碑文, 指出了各个版本的不同之处, 分析元朝时期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语用特征, 并将元代的汉文碑文进行分类。沙畹的碑铭学研究为法国之后的敦煌学研究、西域史学研究、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伯希和亦赞同碑铭学等考古资料的使用, 他为罗振玉先生的《魏书宗室传注》撰写的书评中强调佛教遗迹的题记的重要性: “佛教石窟题记是一个尚未被使用且不应被忽视的信息来源”。^④

《通报》的研究还引进了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语音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主编沙畹积极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 “社会学无疑是汉学学者目前最感兴趣进行研究的学科之一, 因为在面对中国文化时, 汉学家可以借助社会学的科学手段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运用社会学理论发现无数研究主题”。^⑤伯希和在《通报》发表了多篇西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他讨论蒙语与汉语、突厥

① 王国强《视野与评价: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英国汉学——以〈中国评论〉为讨论中心》, 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41-154页。

② 韩大伟《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 第6-14页。

③ 沙畹共撰写了三篇蒙古时期碑铭论文, 分别是: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5, No. 4, 1904, pp. 357-447;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Deuxième parti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6, No. 1 (1905), pp. 1-42;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9, No. 3, 1908, pp. 297-428.

④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 Wei chou tsong che tchonon tchou (“Commentaire sur les biographies des agnats impériaux dans l’Histoire des Wei”) by Lo Tchen-yu’,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24, No. 1, 1927, pp. 79-86.

⑤ Edouard Chavannes, ‘Reviewed Work: Les rites de passage by Arnold van Gennep’,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10, No. 2, 1909, pp. 232-235.

语等多语言之间的对音现象，梳理各语言间的衔接情况，进而考证各民族间的交往历史。伯希和吸收了中国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论文附有大量注释，对比各版本间的不同之处，寻找各版本的出处，伯希和的注释为之后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便利，更为之后的历史语言研究、蒙古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研究方法。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欧洲学界注重与中国学界的交流，以沙畹、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联系，通过《通报》为法国汉学界提供中国最新的研究成果。《通报》“书目”和“评论简报”栏目多次刊载中国学者的专著或中国历史期刊的论文，如沙畹于 1911 年在“评论简报”栏目中为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刊》撰写书评，简要介绍了期刊所刊载相关敦煌遗书的研究。沙畹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的专著。^①伯希和担任主编后，持续关注中国学界，他的书评可以分为两类：首先，伯希和撰写长评评述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伯氏分别为罗振玉先生的《古镜图录》和《魏书宗室传注》撰写书评，详细介绍罗振玉先生的研究成果，并称赞“罗振玉先生的新作是朝代史考证的重要贡献，文章信息的准确性和文章的研究广度值得毫无保留地赞赏”。^②1928 年，伯希和在《通报》上发表《王国维作品集》，文章长达 71 页，几乎涵盖了王国维先生的所有作品，并评价王国维的作品“是如此重要和丰富，我认为很有必要将他的作品详细列举出来，我可以借此机会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③其次，伯希和对中国新派学者的关注。这类学者留学欧美等国，学习了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并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伯希和评论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时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用欧洲语言做出的最好的科学成果。”^④

3. 研究领域的细化

《通报》作为法国汉学界的媒介，期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学术自觉性——期刊在书评中开始评论汉学研究的现状并思考汉学的发展方向。沙畹在多篇书评中表示汉学研究应向多学科领域发展，进行跨学科研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在书评中强调语言学对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之前的汉学研究中，语言学一直被忽视，直到现今从更广泛的汉学角度进行考虑，正如考古研究、历史研究、宗教研究一样，语言学研究逐步受到重视”。^⑤文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支持中国诗

① Ed. Chavannes, 'Reviewed work: Kouo hio ts'ong k'an Recueil de travaux imprimés se rapportant à l'érudition nationale by Lo Tchen-yu, Wang Kouo-wei',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12, No. 5, 1911, pp. 743-746.

②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 Wei chou tsong che tchonan tchou ("Commentaire sur les biographies des agnats impériaux dans l'Histoire des Wei") by Lo Tchen-yu', pp. 79-86.

③ Paul Pelliot, 'L'édition collective des œuvres de Wang Kouo-wei',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26, No. 2/3, 1928, pp. 113-182.

④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by Hu Shih',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22, No. 4, 1923, pp. 309-315.

⑤ Bernard Karlgren, 'Reviewed work: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Grammaire du Kwan-hwa septentrional by Maurice Courant',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15, No. 2, 1914, pp. 283-285.

歌的译介与研究：“中国诗歌已成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无法翻译出玉石的神韵时会感到遗憾，无论如何中国诗歌已经激发了公众的好奇，那么远东学者就应该满足其需求”。^① 宗教研究方面，沙畹希望深入开展道教研究，他为戴遂良《道教》（第一卷）撰写的书评中提出不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道德经》的翻译问题上，应从宏观角度研究道教思想，“道教研究已经成为汉学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② 1953年《通报》出版的《补充索引》按照汉学研究领域通报目录分为13类别，“文献”“宗教”“科技”“艺术”等条目下设子条目，法国汉学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出各学科细化且相互隔绝的特点。

结论

如前文所述，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研究范围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了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沙畹、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打破了19世纪以雷慕沙、儒莲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学派时期”^③的书斋式研究方法，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成立了多个汉学机构，并培养了多位法国专业汉学家，他们善于利用汉文典籍，重视实地考察工作，加强与中国学界的联系，开创了法国碑铭学研究、敦煌学研究、西域史学研究、蒙古学研究、藏学研究、宗教研究等诸多研究领域，由此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 Paul Pelliot, 'Reviewed work: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Florence Ayscough, Amy Lowell',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21, No. 2/3, 1922, pp. 232-242.

② Edouard Chavannes, 'Reviewed work: Taoïsme, tome I,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by L. Wiegner', *T'oung Pao*, Série II, Vol. 12, No. 5, 1911, pp. 749-753.

③ 韩大伟《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第7页。